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在其人际交往中的体现

朱与墨, 邓腾云¹

(深圳大学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湖湘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底色,湖南第一师范秉承湖湘文化传统,采用民本的教育理念和民主的办学治校措施。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和社会活动为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积累了实践经验和准备了文化思想条件,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结合后便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坚持群众路线,对当代群众路线守正创新、建设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毛泽东; 群众路线; 人际交往; 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 D252;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1)02-0033-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1.002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把我们打败,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建设主题活动一个接一个,从“群众路线”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从严治党密集进行。其中一个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加强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在新时代实现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中,依然不能偏离群众路线。对毛泽东群众路线形成溯源有利于新时代坚持这一根本政治路线不动摇。毛泽东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在人际交往中严格坚持群众路线,这对当前干群关系、政商关系建设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一 湖湘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毛泽东的熏陶

毛泽东修学储能成长于湖南,1923年30岁调党中央局工作前,其工作、社会活动和波澜壮阔的早期革命活动也以湖南为中心,活动枢纽则为其母校湖南第一师范。湖湘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上古时期炎帝神农氏授民播种之术、为民尝百草之味,“令民知所避就”^[1]。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屈原更表现出了浓厚的民本思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2]

屈原在《离骚》等作品中以诗歌的形式展示了民本思想。东汉时期曾在长沙为官三年的贾谊,其民本思想则更为直接,“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3]

王夫之心怀天下,对于“当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尝试与谋”(《读通鉴论》卷八),迫于时政而不能参与政治实践,其民本思想主要通过著述来体现。王夫之提出“扶危定倾,以得人心为本务”(《读通鉴论》卷十三),历史上提出重民思想者不乏其人,但王夫之的民本思想结合了历史事件,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感。王夫之还提出了善政的标准,即利民之政,这与束缚民之稗政、迫害镇压民的苛政相对应。王夫之提出了“君以民为基”与“无民而君不立”的思想。王夫之不仅提出理论,还设想了具体的操作办法,提出了抑制兼并土地和“严以制吏,宽以养民”的主张。谭嗣同继承了王夫之的思想,提出了“民本君末,君由民择”,“君以民为天”。

近代魏源更是将民众比喻为鼻息以显示民众之重要。被喻为“口”“喉舌”的诤臣可整日闭着,但鼻不可不通,魏源正是因为担忧鼻息不畅,而重视民

[收稿日期] 2020-1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研学基地德育功能的开发与研究”资助(编号:19BKS149);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和党群关系发展的启示”资助(编号:13JD16)

[作者简介] 朱与墨(1972—),男,湖南郴州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教授,特约研究员,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师,博士。

¹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毛泽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意。不过分重视喉舌之臣,才有了之前的圣帝明王。近代中,黄兴提出“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诸如此种名言,不一一列举,湖湘文化的精髓除“经世致用”就是“以民为本”。毛泽东求学的湖南第一师范前身为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齐名,相较于岳麓书院,其地处长沙南门闹市外,交通便利、风景优美、闹中取静。因此,湖南文化名流,无论是朱(熹)张(栻),还是曾(国藩)左(宗棠)都曾或藏修或任教于此,近现代湖湘五大人才群体无不与此有关,城南书院因此被誉为“昔贤过化之地”“湖湘文化演练场”。毛泽东求学时,学校中西结合汇集了湖南最好的师资力量,其中不乏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此外毛泽东还常常到船山学社听讲座。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的人本思想浸染,如他在1913年《讲堂录》中写道,“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

二 第一师范求学对毛泽东群众路线形成的影响

城南书院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相继改为师范学堂、国立省立师范学校,其在坚持优良的湖湘文化教育传统时,敢于采用民本的教育理念和民主的办学治校措施。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工作了八个多春秋,这八年多的经历对其日后革命工作中群众路线有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学校学生自治的管理措施

湖南第一师范早期师范教育推行学生自治,最主要的举措就是组织技能会,后改为学友会。该会“专为补助学校教育而设”,“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学友会设有演讲部、文学部、图画部、书法部、音乐部、手工部、教育研究部以及各项体育运动部。它们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各部都围绕各科教学展开课外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动手能力,旨在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4]。在学友会中教师为赞助会员,学生为基本会员,是师生的共同组织。师生在课外活动中加强联系,教师全方位、全程育人。校长孔昭绶兼任学友会会长,实际主持学友会日常工作的是总务,总务下面再设各部部长。孔昭绶1916年回校再任校长以后,改变原来总务、各部部长由老师兼任,提倡学生主动自治,将老师兼任全部改成了由高年级学生担任,这使得学友会真正成了学生做主的自治管理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学校当时的管理章程,学友会、校务会是并列的学校

管理机构,学友会管学生工作,校务会管办学教学,全面实施学生自我管理。毛泽东他们这些学友会的成员,就名列学校的管理层,学生毛泽东的名字就排在校长孔昭绶的后面。

从1915年到1918年毕业,毛泽东每个学期都在学校学友会担任重要工作。具体而言,从1915年秋至1918年夏,毛泽东都是学友会领导成员,前四个学期任文牍,负责文告起草和会议记录,参与日常会务领导工作。后两个学期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主持学友会工作。毛泽东任学友会总务期间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与组织才能。例如,“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出任总务的32天,组织各部开展学术、体育活动达64次”^[5]。后毛泽东又领导湖南一师高年级学生主办工人夜学,亲自写就宣传告示,当时湖南一师周边有很多工厂,如造币厂、黑铅炼厂和电灯公司,毛泽东等到各厂宣传,取得良好效果,最终招收了120名产业工人。

(二) 学生相互评价的考核制度

学校的人物互选制度,由学生考查、评选优秀学生。考查评选内容按德育、体育、智育排序,智育因为有学校的考试,所以在人物互选中就排在最后。德育包括敦品、自治、好学、俭朴、克己、服务(公益活动),体育包括胆识、卫生、体操、国技,智育包括文学、科学、职业、才具、美感、言语。人物互选培养了学生自动自治的民主精神,是学校推行民本主义教育的重要体现。人物互选由学生做主,一切由学生投票决定,评选不限范围,不限班级,全校学生随你投,谁优秀就投谁。评选不限名额,选上多少人是多少人。评选过程老师一律不参与,评选结果也没有奖励,只张榜公布和存档,没物质奖励,也没有额外的好处,既不发奖品,也不考试加分,纯属精神层面的名誉而已。但这是学生重大的活动,学生对此很重视。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德智体全面发展,赢得了同学们的称赞,在人物互选中“圈粉”最多。校志(1918)记载1917年6月开展了“人物互选”活动,其目的是考查学生学业与操行,促进学生向上,培养选拔人才。其具体做法是,每人投三票,每票限选举一人,被选者不以本班为限;投票使用双记名法,被选人写在上端之右,选举人写在下端之左;选举人应按规定之标准将被选人的考语事实详注票内。选举结果,全校11个班,400余人参加。当选者34人,其中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六项中当选。即“敦品”11票,“自治”5票,“文学”9票,“言语”12

票,“才具”6票,“胆识”6票,共49票,为全校之冠。这次“人物互选”活动充分说明,青年毛泽东不愧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师范生,学生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三)巡回讲演与修学旅行的社会调查制度

毛泽东求学湖南第一师范时,学校注重社会调查,推行巡回讲演制度。学校派教师和学生到招生辖区范围内的小学进行教育调研、社会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完善、改良学校教育教学的依据。学校还有修学旅行制度,要求每学期学生要修学旅行一次,鼓励学生做社会调查,了解社会百态,察民德、民智、民力,培养学生的调查能力和分析能力。毛泽东注重“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读“有字之书”外,他还喜读“无字之书”。1917年暑假,邀萧子升不带分文,进行修学旅行,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城镇与农村,步行900余里。1917年寒假,又与陈绍休走访了浏阳市铁炉冲一带。1918年夏初,还同蔡和森游历了洞庭湖滨的岳阳、湘阴、沅江等地,广泛接触人民群众,进行社会考察。游学既锻炼了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能力,又养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后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的完成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方法论的提出,都离不开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锻炼和养成的社会调查能力和习惯。

(四)任职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民主治校

“驱张运动”成功、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顺利开展后,1920年毛泽东任一师附小主事,并被推举为一师校友会会长。担任主事期间,毛泽东积极发动教员力量开源节流、扩大办学规模。为彰明民主办学,他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并挂在学校大门上。在任期间,毛泽东作出一系列改革,切实解决办学中突出的问题。毛泽东改革了招生制度,扩大了招生范围,将只从省内招生变为省内外学生皆可报名,从主事一人决定录取事宜到根据学生试卷分数情况再通过校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毛泽东还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工农学生的年龄情况、经济情况,放宽入学的年龄要求,就学杂等费用而言,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分次交齐,改变过去只能一次交齐的惯例。针对一些失学或中途退学的青少年,毛泽东还开办了成人失学补习班,以满足失学青少年的学习需求。

可见,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和工作经

历为其民本情结、民主思想描绘了底色,也为其日后提出群众路线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三 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

毛泽东在湖南的求学和工作使他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基本经验,1920年他在北京读到《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成了其工作的不二法门。特别是开展“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创办自修大学和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其成功的基本经验都是依靠和发动群众。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就明确指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1923年毛泽东离开湖南走上职业革命生涯后坚持把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作为其工作的基本遵循。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善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领导人,因此,他能成功地开展农民运动、能成功缔造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党的早期革命军事活动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化险为夷无不是依靠群众取得的。

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创立者,毛泽东逐步确立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并以具体实践方式丰富了群众路线。1927年基于对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发表文章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初步阐述了要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6]。1929年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把自己工作的基本经验和遵循表述为“群众路线”,最初内涵主要为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党的工作。1930年毛泽东在名篇《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党的正确工作指导来源于深入群众,对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阐述。到了延安,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时间阅读马列著作,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水平不断升华,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为可能。1943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标志着群众路线经实践检验和系统总结已经成熟,党的七大把这一路线作为根本路线写入党章^[7]。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8]由此可以看出,群众路线的实践伴随着党的发展历程,成为了重要的工作指导法宝。具体而言,党的群众工作是群众路线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发

展的群众路线思想又反过来继续指导党的群众工作,并进一步扩大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系列文章中从不同角度重申、丰富和深化群众路线思想。

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在多个维度展开。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发动民众方能获得战争的无穷无尽的供给,依靠民众能克服一切困难,党群关系就是鱼水关系等^[9]。关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照顾多数的观点,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共产党的权力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广大群众给的等^[10]。关于自觉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党的一切领导工作必须从群众中集中再到群众中去实践,无限循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联系群众,像种子和大地一样,党员同人民结合,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等^[11]。关于群众立场,毛泽东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党员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员应站在民众中,绝对不能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的群众立场不同于国民党等剥削阶级同爱牛(目的在于耕田和挤奶)差不多的“爱民”等^[12]。关于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毛泽东认为除了领导农民土地斗争,分给农民土地外,还要关心和注意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柴米油盐、生疮害病,小孩读书等,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党和人民密切联系,敌我力量就会发生变化,敌人无法战胜我们等^[13]。关于提高群众工作本领,毛泽东指出基本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要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战争、生产和群众工作三结合,群众工作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命令主义是错误的,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要群众讲话的方法、民主的方法等^[14]。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内涵在这六个维度展开,有机统一,成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人际交往

毛泽东是群众路线的创立者,在工作中是积极的倡导者和不折不扣的践行者。除重大决策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到群众中深入调查研究外,其日常人际交往中也坚持五湖四海群众路线,不搞小圈子山头

主义,处处体现群众路线的光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人际交往范围广、对象多,但其交往的原则是坚持群众路线,即做事论理论法大公无私,私交论情讲义而不损公肥私。下面我们选择毛泽东人际交往的几个方面来呈现其人际交往的原则和艺术。

(一) 亲友请求,铁面无私

建国初期,有大批亲朋旧友写信给毛泽东,或要求安排职务、或要求办理入党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粗略统计,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回复相关亲情的信件大约有170封,涉及亲朋故友150余人。”^[15]例如,儿时在外婆家与毛泽东玩得最好的表兄文松南写信请求毛泽东为其一亲戚(文昌运)介绍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5月12日回信,“昌运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6]。该回信让文松南大失所望。毛泽东对于凡进京要求解决工作等诸如此类事情的,态度明确,即不准来,来了北京也不见;对于类似解决工作方面的请求,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对待公事,论理论法,讲求规则,不因自己位高权重而到处发话,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点也可从《毛岸英写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看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慧的哥哥农业专家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想到北京工作,被毛泽东拒绝,其表兄弟向三立写信给毛岸英想帮杨开智在湖南谋得厅长职位,毛岸英回信写道:“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接着他写了对外祖母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仍不能徇私照顾杨家照顾向家,即使被至亲不理解、挨骂,他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17]。至于父亲,毛岸英写到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17]。毛泽东的大公无私由此可见。

(二) 恩师困难,慷慨相助

毛泽东并非冷血无情之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一些处在基层,生活困难的老师恢复联系,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但他不是慷公家之慨,而是以其个人稿费加以接济。如对于解放后已经去世的邹春培老师,毛泽东把关心延续到其儿子邹普勋身上,几次专门写信,关心其健康,多次寄生活费接济其生

活。毛宇居是毛泽东私塾老师中最年轻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数次与其通信,并通过其关心家乡建设。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启蒙老师李漱清的两个儿子追随毛泽东革命牺牲,解放后毛泽东邀请他到北京做客,在家里3次设家宴招待,并有多次书信问候。但当1953年家乡遭遇“粮亏猪贱”困难,李漱清上书毛泽东要求解决困难时,毛泽东直接告知不愿也不应当干预地方事务。私塾老师毛麓钟的儿子毛泽普1937年到延安参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任地市领导,有人建议调中央机关任职,毛泽东坚决反对,要回避用人唯亲。在湖南第一师范为毛泽东打下扎实国文基础的袁仲谦老师,因生前嫉恶如仇大骂地方贪官污吏、劣绅,死后被刁难,不准立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知道后亲书“袁吉六先生之墓”。得知师母经常挨饿,1950年4月,毛泽东派专人从湖南新化接师母到北京住两个月,为师母体检,做衣服做鞋,为师母划桨游中南海,临别送师母两大箱日用品,此后,毛泽东逢年过节就给师母寄钱物,关心照顾师母直到其1970年去世。毛泽东听闻湖南一师校长张干生活困难,便多次接济,1963年最后一次给张干2000元;帮助王立庵老师儿媳吴启瑞解决子女上学的困难等。曾在湘乡高等小学堂和湖南第一师范两度担任毛泽东老师的教育名师张有晋,解放后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毛泽东在家设宴招待,并多次安排医生给老师检查身体。毛泽东关心、尊重的老师还有郭佰勋、谭咏春、胡汝霖、罗元鲲、刘策成、黎锦熙、王季范等(毛泽东与老师的交往可详见黄露生的《毛泽东的尊师风范》)。对于支持过革命事业的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会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部分用于报答,如在1963年至1973年期间每年都给章士钊2000元,感谢他当年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筹集经费。

(三)平民故交,感情如故

毛泽东年轻时的很多同学、故交好友都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艺术家、文学家、教育家等。但也仍然有很多平民百姓,毛泽东仍旧交往如一,感情依旧。如1927年曾掩护自己脱险、一直生活在乡下的张有成,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寄钱接济他生活,还邀请他到北京做客。1925年曾为回乡养病的毛泽东治愈疾病的杨舜琴,参加过革命,两个儿子为革命牺牲,解放后毛泽东回韶山邀他叙旧,敬坐首席,邀请他到北京做客,还赠书寄钱。农民运动时期结识的乡下教师蒋端甫,解放后,多次与毛泽东书信往来却一无所求,被毛泽东称为“君子之交”。1919年在

汉口偶遇的流浪少年许志行,毛泽东资助和鼓励他求学,解放后邀请他到北京家里做客。朱其升和彭友胜是毛泽东1911年参加新军的战友^[18]。解放后,毛泽东与两人常联系,邀请到北京做客,资助朱其升500万元(旧币)建立油布雨伞厂,对于彭友胜恳请安排工作并未答应,只是证明其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和自己同一班为副目。唐自刚早年参加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当营业员、经理,后又入党,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农民运动,与毛泽东相识6年,相处很好,马日事变后,与党失去联系,回乡教书。解放后与毛泽东恢复联系,被毛泽东邀请进京做客,并安排学习新知识,毕业后随王震赴疆工作。还有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参加运动并救过自己的郭仕遼,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并邀请进京做客。

(四)同窗旧谊,鼓励进步

青少年毛泽东喜欢交友,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发“征友启事”传为佳话。毛钦明、毛森品是毛泽东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两人在农民运动中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毛钦明不幸牺牲,毛森品回乡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毛泽东主动联系上了毛森品,不仅写信勉励他出任工作,并对他的生活关怀备至,三次赠款接济他的生活。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五四运动期间,曾与毛泽东一起掀起驱张运动,毕业后留校任教,1950年任教导主任。解放后,毛泽东与他都有书信往来,安排他与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进修学习,鼓励他大胆工作,积极开展语言文字改革研究。同学中,毛泽东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周世钊,周世钊是新民学会的骨干会员,但他投身教育事业,并未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毛泽东鼓励其大胆工作,后其担任教育厅长和副省长。

(五)工作交往,广泛典型

革命初期,毛泽东接触学生与教师多,后来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接触工人农民战士多。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到各地调研,深入群众,接触的普通群众更多。毛泽东的多年战争生涯,与普通士兵交往实在太多,既有背普通士兵的故事,又有到40里外的野战医院满足重伤士兵弥留前“面见主席”的愿望,还有参加普通士兵张思德的追悼会,并留下千古名篇《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住过很多地方,认识很多房东,交了很多平民朋友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如与房东高玉张亲如一家,毛泽东说“你的娃就是我的娃”。撤离王家湾时,用警卫排

掩护群众撤退,群众没转移自己不撤退。还有派医护人员帮井家坪井生芳家抢救病人等。解放后,毛泽东还偶然结识很多农民朋友,如兰考县的孟宪德、北京市郊的鱼池村的张振等,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的林赛华等,毛泽东深入农户调研,嘘寒问暖。毛泽东还帮中学生王桂芹批改日记,推荐发表。对其假期回乡参加劳动锻炼,大加赞赏,并两次安排医生为其看病。劳动模范、英雄人物以及基层干部的优秀代表也是毛泽东特意交往的对象,这体现了他人民本位的价值观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也与很多劳动模范相识,交往密切。如新中国成立后,他两次邀请劳动模范国庆观礼,1951年接见最年轻的无名“渡江英雄”16岁的小马,并请到家中做客,代为取名马毛姐;接见抗美援朝战场“活的罗盛教”黄治富。十次接见,八次握手走合作化道路的劳动模范王国藩,多次接见工人劳模王进喜,在71岁时把自己生日宴开成“三同会”,邀请工农兵模范王进喜、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共同进餐。总之,毛泽东生活、工作、战斗的地方很多,他深入群众,平等待人、相互关心,或以小学生身份出现、虚心向群众学习;或以忠厚长者身份出现,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或以“救星”身份出现,对群众疾苦感同身受,舍己救人,助人为乐。

另外,由于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毛泽东的人际交往还包括了与敌人、政治对手的交往。而在与国民党要人的交往中,毛泽东坚持开诚布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诚信”为交往的首要原则,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赢得了国民党内要人的尊重与佩服。如延安撤退后,蒋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察看毛泽东的生活情况,当向附近农民了解到毛泽东深入群众,自己一边生产种菜、自给自足,一边还领导共产党开展军事斗争,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蒋介石内心受到极大震撼,悟到了无法战胜共产党的原因,沉默良久,黯然离开。

(六) 人际交往,妙语连珠

毛泽东在诗词上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在与人际交往时之所以能如鱼得水,群众路线开展得游刃有余,其语言艺术的魅力功不可没。一是善用称谓。毛泽东交往对象广泛,而与人交往,免不了有个称谓问题,毛泽东善于用不同称谓来称呼不同的群体、对象。不仅对于身边的卫士、文书,毛泽东以其名字相称,对于其他领袖人物,毛泽东亦直呼其名,可见其与身边工作人员平等、与同事团结合作的关系。毛

泽东还善于根据交往之对象的不同特征予以不同称谓,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朱老总”“彭大将军”等。二是善释姓名。毛泽东在中南海碰到一小舞伴,问其姓名,答曰“孟锦云”,毛泽东便说,与孟夫子同姓,名字也好听,锦上添花比锦上添花更好。此番话后,小姑娘轻松不少。毛泽东善于解释他人之姓名,可以消除紧张,拉近距离。三是比喻幽默。毛泽东常常在危难时刻,用幽默带给大家欢乐,消除大家的紧张与不安,往往还能起到提振士气的作用。如胡宗南派几十架飞机轰炸延安,正好有燃烧弹落在毛泽东的门口。毛泽东见此情景,对进屋汇报的战士说,“客人走了吗?”战士们不明所以,不知何人来访。毛泽东指着天上说:“飞机呀,喧宾夺主,讨人嫌。”大家一听都乐了。曾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率领昆仑纵队来到田次湾,毛泽东与很多同志挤在一个窑洞里睡。房东大嫂非常不安地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起首长了。”毛泽东顺着大嫂说话的节律说道:“我们的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19]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民感情在笑谈中加深。毛泽东的日常语言洋溢着对群众的爱、尊重与平等。

五 结 语

建党百年恰风华正茂,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自身无任何私利。毛泽东人际交往坚持群众路线原则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清亲新型政商关系”有很大启发。所谓的“清”即指政商关系的“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所谓“亲”,即指加强政商之间的联系,使得政府更好的服务于公司、企业等商事主体,同时商事主体也配合好政府主体的行政管理。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坚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实现新型政商关系“亲”而不“腐”,“清”而有“为”。

[参考文献]

- [1] 刘安. 淮南子[M]. 顾迁,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9:263.
- [2] 屈原. 屈原集校注[M]. 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6:39.
- [3] 贾谊. 新书校注[M]. 阎振益,钟夏,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0:338.
- [4] 朱与墨,李科生. 湖南一师早期民本主义教育对当代的观照[J]. 中国电力教育,2010(15):196-199.

- [5] 孙海林,文小妮,等. 教育家的摇篮:湖南第一师范[M].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31.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2.
- [7] 庄福龄. 毛泽东思想概论[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22.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1.
- [10] 毛泽东.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81.
- [11] 毛泽东.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
- [12] 毛泽东.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M]//毛泽东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7-58.
- [13] 毛泽东.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M]//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
- [14] 毛泽东.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M]//毛泽东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80-281.
- [15] 尹韵公.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如何闯过亲情关:基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搜索[J]. 党的文献,2015(2):86-93.
- [16] 毛泽东.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66.
- [17] 毛岸英. 毛岸英写给表舅向三立的信[EB/OL]. (2015-08-06) [2020-10-1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6/c_128098998.htm.
- [18] 杨庆旺. 毛泽东和他的平民朋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46-166.
- [19] 王红宇. 毛泽东幽默艺术赏析: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6周年[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1):20-24.

Influence of Mao Zedong's Mass Line Thought on hi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ZHU Yu-mo, DENG Teng-yu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Huxiang culture has a deep background of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dhering to huxiang culture tradition, Hunan First Normal School adopted people-oriented education concept and democratic school management measures. Mao Zedong's study and social activities in Hunan First Normal School had accumulate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prepared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onditions for CCP's mass line thought. After its combining with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pistemology, the Party's mass line was formed. Mao Zedong'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dheres to the mass line, which has great value to keep and innovate mass line contempora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Key words: Mao Zedong; mass lin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business relations

(本文编辑:刘衍永)